

人口学家访谈

从知识经济的内涵看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访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彭希哲教授

夏业良

在国际人口学界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人口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彭希哲教授，是恢复高考制度后复旦大学经济学的第二届本科生。1982年毕业前即被选拔参加公派留学前的外语集中培训，1983~1988年在享有盛名的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先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1988年底，彭希哲博士回到母校执教，成为改革开放以后复旦大学文科第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回国工作的青年学者，1991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当时年仅37岁），1993年被评定为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7年被国家教育部确定为“跨世纪优秀人才”和学科带头人。

彭希哲教授自1989年以来先后承担并完成“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口控制”、“中国妇女就业与生育率”、“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中国农村多胎生育研究”、“苏南农村乡镇企业发展与农村社会保障”等科研项目。日前正与他的同事们一起进行有关人口老龄化、妇女就业权利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1992年因其对中国人口转变问题的研究获霍英东教育基金青年教师奖，其后曾多次获得各种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他的博士论文《人口转变：中国五十年以来的生育趋势》（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被国内外许多学校列为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指定参考书。

彭希哲教授是国际人口科学联盟会员，曾当选为该联盟生育比较专业委员会委员，在1997年召开

的该联盟23届大会上又被推选为提名委员会委员。他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和上海市人口学会副会长，并曾兼任《人口》杂志的主编。近年来彭希哲教授经常赴英国、美国、荷兰、挪威等国访问研究，与国际人口学界和国家有关政府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为复旦大学人口与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学科发展和国际交流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笔者在彭教授繁忙的公务与外事活动间隙进行了短暂的采访，请他就目前中国社会的某些相关热点问题简略谈谈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笔者：彭教授，您在80年代末就曾在英国《中国季刊》杂志上发表“中国生育率转变的主要决定因素”，在美国《人口与发展评论》上发表“大跃进对中国各省区人口变动的影响”等重要论文，那么您对近年来的中国人口发展趋势有何评判？

彭希哲：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状况已基本得到控制，人口已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但我们应该看到，由于人口发展惯性的作用，虽然我国总体生育水平已经低于替代水平，但每年的人口绝对增量仍然十分可观，还须40年左右的时间总人口才可能在到达15~16亿时实现零增长。也就是说，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的压力仍将十分巨大，人口控制仍将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

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人口较大规模的迁移流动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我国人口发展趋势的

主要内容。近一亿流动人口的存在使我国劳动力资源能更好地按市场要素配置的原则分布,从结构和总量上平衡各地区劳动力的供求。人口流动是一次现代化的启蒙运动,能以相对小的代价获得高效率的社会经济回报。人口流动的方向和强度将对我国未来人口的地域分布产生重大的影响。

同时,我国人口发展又开始面临许多新的挑战。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和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在加速度地增长。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地区,人口老龄化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保障福利事业的负面影响正在凸现。而由于人口流动的作用和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差异,今后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将较城市更为突出。目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城市地区的老龄化及其对策,农村老龄化问题尚未引起充分的重视。

笔者:目前全国上下都很关注“知识经济”这一新概念,报章上有不少文章说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知识经济”的内涵,并且把它与中国的人口转变、人口迁移和人口质量的提高结合起来呢?

彭希哲:我本人对“知识经济”没有什么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知识经济时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它的进程受现有人口素质和结构分布的影响,同时也必然制约未来人口的变动。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是一个逐渐扩散的过程。如同当年蒸汽机的发明只是标志着大工业文明的诞生,而在世界范围内至今尚未实现工业化一样,知识经济的曙光要发展成阳光普照还需一定时日,但适当的产业和发展策略可以加速这一转变。如果说知识经济在美国已初见端倪,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正在向此迈进,那么中国则还需经过相当的努力才可能先在局部地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未来中国人口政策的核心,也是逐步以人力资源替代自然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措施之一。中国人口无论就身体素质还是文化素质而言都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这已成为未来中国持续高速发展的瓶颈。完善妇幼保健和生殖健康服务以提高人口的出生素质是整个人口素质提高的起点,而大力普及和发展全民教育则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人口素质的关键所在。我国目前的教育发展状况是难以令人满意的,教育投入的绝对量及其占GNP的比重都很低,不合理的教育结构和陈旧的教学方

法都难以培养知识经济时代所要求的大量具有创造性的高素质人才。

笔者: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即将到来,作为人口学界的专家,您对这次普查有哪些期望和建议?

彭希哲:新中国已经成功地开展了四次人口普查,每一次普查都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为规划和推动其后一段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翔实的人口资料。第五次人口普查将在2000年进行,这是我们在新世纪所进行的第一次普查,因而有着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和现实作用。

第五次人口普查将在吸取以往普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无论在普查方案和问卷设计还是普查内容上都有较大突破。作为人口科学工作者,我们已经参加了多次有关普查的咨询会,体现了国家统计局部门搞好普查的科学态度和谨慎精神。相信经过理论与实际工作者的通力合作,这次普查一定能获得预期的成果。

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经对我国人口动态产生了重大影响。人口流动性明显加强,加之我国户籍制度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我国人口的地域和城乡分布将可能出现新的整合。婚姻家庭状况的变化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另一个变化显著的人口现象,家庭结构与功能的转变将对我国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劳动力的供给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直接作用于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希望这次普查能尽可能多地收集影响我国目前人口发展态势的主要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做好全国和区域社会经济规划的规划和实施工作。学术界和政府统计部门的合作已有良好的基础,希望本次普查能进一步密切这种联系,让学术界尽早获得使用普查资料的便利,以缩短资料开发的过程,使之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笔者:作为一位人口经济学家,您对上海市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状况以及上海市未来十年的就业趋势有何判断?

彭希哲:劳动力资源与就业人口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准确掌握劳动力资源未来供给的变化趋势,采取适宜的就业政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劳动力资源的变化及发展,主要取决于总人数和人口的年龄构成,在一般情况下,是随着总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的。上海自1993年起户籍人口已开始出现自然变动负增长,如无重大人口政策等方面的变化,未来上海人口总量规模主要受人口迁移流

动的影响。上海市 1990 年的劳动力资源总量为 852.12 万人, 占总人口的 70.2%。而世界上劳动力资源占总人口比重 59.0%, 其中发展中国家为 57.0%, 发达国家为 65.0%, 上海市已远远超过上述标准。因此, 上海正处于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状态。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及有关资料的推算, 上海市劳动力资源在 1996~2005 年间, 比 1995 年还要多 36 万人左右, 也就是说, 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中, 只要不出现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的超高速、急需劳动力供给支撑的经济增长, 上海市劳动力资源就不存在“匮乏”的问题。而 2006~2010 年以后,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将有大批劳动力进入退休年龄, 劳动力总量会出现下降趋势。

目前上海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低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 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也有较大提高, 而 16~24 岁年龄组的劳动力参与率呈下降趋势, 同时劳动力资源的老龄化程度也不断凸现。上海就业人口的三大产业结构已发生较大的变化, 1995 年从业人口分别占 12%, 51.6% 和 36.4%。可以预见未来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将大大缩减对劳动力的需求, 进一步影响劳动力供求关系。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 整个劳动力人口都将面临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结构性失业将成为经济生活中经常存在的一种现象。换句话说, 劳动力根据市场的需求和个人的偏好更换劳动岗位是正常的情况, 一定数量产业后备军的存在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因此, 只要对经济整体发展有利, 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前提下, 可以保持一定的失业率。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适度非均衡, 既给更新就业观念, 促进劳动竞争形成一种有益氛围, 也给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 and 制度改革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

帮助下岗劳动力再就业将是一项长期存在的工作。我们应当正确理解再就业(或就业)的概念。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可以找一份长期稳定的全日制工作, 也可以是钟点工或弹性制的非正式职业, 可以是阶段性的就业, 也可以利用下岗待业期间参加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职业培训以提高个人的人力资本含量。不同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对劳动力就业的安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何种形式再就业或不就业, 除了劳动力市场的客观条件外, 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主观选择与偏好。

目前下岗人员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口群体。不同年龄、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家庭状况和不同职业的下

岗人员对再就业有不同的想法和要求。因此, 随着再就业工程的深入开展, 我们的工作也应当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首先要了解各不同人群的需求, 然后是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比如说, 对于年轻的下岗人员应更多地鼓励他们珍惜下岗待业这一休整阶段接受较长时期的正规职业教育, 以从根本上解决由于劳动力素质低而造成的失业问题; 对于有一定技术专长的中年工人, 应充分利用和保护这部分人力资源, 动员他们打破就业的地域限制, 随上海原有产业的梯度转移而到外地去寻求发展的机会; 而对年龄较大身体较差的则可通过短期培训转岗从事社区和家政服务等项工作, 并为上海老年化社会的到来作好准备。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 在工作方法上应分类指导, 在政策措施上也应综合配套。

笔者: 近几年来, 您比较多地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 探寻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关系, 可否谈谈这方面的研究?

彭希哲: “可持续发展”自 80 年代以来已日益取代传统的发展观而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发展观。人口因素在可持续发展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人口对环境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人口生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口惯性和滞后效应, 存在着延续几代人的代际外部性(intergenerational externalities), 因而人口生产是关系当前和未来整个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公共事务。可持续发展的成果一方面被用于维护和改善当代人口的生活质量, 同时有相当部分被用于维持和发展资源基础, 其本质是技术和人力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替代。过快的人口增长消耗了过多的发展成果, 限制教育的普及和提高, 阻碍技术进步, 延缓人类资源利用方式的革新, 推迟上述替代过程的实现。由人口增长所引致的贫困更使得贫困人口为生存需要而进一步破坏本已恶化的自然环境, 造成人类对发展的选择余地的缺乏。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人口的过快增长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但决不能将人口因素的作用绝对化。由一定数量的自然人口与消费和生产方式相结合构成的消费人口(Consumption Population)比之纯粹自然人口对可持续发展影响更大。过度消费是造成环境状况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产生的延期债务(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债务)剥夺了后代人合法的选择机会, 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富裕国家或人口群体对环境的要求和索取比穷人更

多。全球生态退化的 3/4 是生活在富裕国家的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所造成的。在同一个国家内, 发展对环境的压力并不是均衡地在不同人群中分配的, 往往是相对富裕的人群更多地使用和污染本已匮乏的自然资源。而另一方面, 穷人通过提高消费水平以摆脱贫困, 达到小康水准的人们希望进一步改善生活, 生活水平的提高将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在区域经济发展日趋不平衡的状况下, 防止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模仿发达国家富人的生活方式和过度消费, 规避“消费示范”弊病的蔓延, 注意环境意识与对环境产生影响的消费和生活方式的背离现象, 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是在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 也是事关国家的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

由于人口动态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差异, 我国各地区处在人口转变和生态转变的不同阶段, 面临不同的资源基础和环境问题。部分贫困地区人口为了生存而造成国际劳工组织的专家们称之为“被迫的环境恶化”(Forced Environment Degradation), 而一些相对发达地区则出现类似于西方国家过度消费的问题。政府政策必须在推动经济增长、公平地满足社会需求和控制环境恶化之间作出权衡。

鉴于人口因素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和调整人口结构特征, 使新增人口素质更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应是政府人口政策的重心。“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 也就是要为当前和未来提供一个数量合理、质量优化的人口群体, 是在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应优先考虑的发展战略之一。

笔者: 不久前, 您和您的博士生在《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上发表了“从‘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看社会变迁”一文, 引起很大反响, 《新华文摘》(1998年第6期)也全文转载了这篇论文, 请您谈谈对这一特殊群体进行专门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彭希哲: 所谓“知青一代”是指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期的那一代人。从知青一代的生活经历和职业流动中,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族如何从十年动乱的阴影中振奋与复兴, 通过改革开放而逐步起飞, 我们看到节奏不断加快的社会经济变迁。受这一历史过程深刻影响的知青一代, 虽然在青春时期

失去了许多机会, 但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奋力向上, 充当了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 为国家发展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凭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这一代人顽强地与命运拼搏着, 默默地承受着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和赡老抚幼的重担。

与我们知青一代在时间上相仿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Baby Boomers, 即婴儿出生高峰人群。顾名思义, 这是指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由于这一人群在数量上和社会经历上的诸多变迁, 在各国都成为较为特殊的群体, 对这一代人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从这代人的经历、特点、分化, 以及他们对当前和未来社会经济的影响等都成为研究和传媒追踪的对象。而在我国, 除了文艺界有较多的作品直接以这一代人为原型外, 学术界对此的研究相对薄弱。

知青一代是对我国, 特别是城市地区未来人口和就业问题影响最大的出生队列。首先是这一代人的绝对数量大, 成为人口年龄金字塔中凸出的一段。其次是这一代人相对其他年龄组来说, 整体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偏低。年龄和知识技能上的明显劣势, 使得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最脆弱的地位, 成为“再就业”工程中最为艰巨的工作对象之一。当这一代人进入老年阶段后, 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将进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根据我们现行的许多社会政策措施, 同时由于人口转变所推动的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 知青一代中的许多人将在老年以后处于相对不利的境地, 对今后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形成强大的压力。

可以预期, 知青一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将继续分化, 其中的一部分人通过向上流动成为管理干部和技术专家, 也有相当的部分“下岗”待业或成为社会弱势群体。这种分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在改革开放以后接受教育的状况等原因所决定, 是寻求社会公平和稳定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由于这一代人因自身经历而形成的对社会的观察力以及对社会支配力量的增强, 这一代人将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因此, 对这一特殊人口群体应当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作者工作单位: 复旦大学人口所 上海 200433)